

第一章 秦汉时期福建海外交通的起步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境内多山，西、南、北都有崇山峻岭与外界隔绝，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惟有东南滨海，亘长的海岸线上有无数的天然良港，具有发展海上交通的优越条件。因此，早在远古时代，福建人民就长于舟楫，擅于航海。然而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阻碍了福建的开发，直至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仍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与海外的交往不多，海外交通尚处于开创的阶段。

第一节 越人时代的航海活动

汉代以前 中国南部是古越人聚居的地区。“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互不统属，生活在福建的古越人被称为闽越。闽越族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 7000 年前，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至战国末期，越王勾践的后裔无疆伐楚，楚威王大败之，杀无疆。〔2〕越国亡后，无疆子孙有率其族人入闽者，与土人战。传至无诸，遂战胜土人，自立为闽越王。秦一统天下，置闽中郡，废闽越王为君长，首次将

〔1〕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引“臣瓚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第 1669 页。

〔2〕 陈衍：《福建通志》总卷 1，《通纪》，1938 年版，第 1 页。

福建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无诸率越人从诸侯击秦。秦亡，楚汉相争，无诸佐刘邦击项羽。汉朝建立后，无诸以功复封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州）。〔1〕

越人社会经济虽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其人却以水上生活为主，“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2〕。闽中地深昧而多水险，闽越人多滨河旁海而居，生息于河海沼泽之中，故尤“习于水斗，便于用舟”〔3〕，很早就开始了造船和航海活动。无诸死后，闽越王郢企图扩大领地，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出兵从海上围攻东瓯（今浙江永嘉），汉朝派兵从海上援救东瓯，闽越见势难敌，遂撤兵回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从海上进攻南越，虽因汉朝的援救而再次受挫，但由此可见闽越人航海活动之规模。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杀国王及汉使节，起兵反汉，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击南越。割据福建的“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今潮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4〕。拥有八千人的海军在当时来说是一支相当庞大的船队，不仅说明闽越人素以航海活动见长，而且还有较发达的造船业，才能够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和军事行动。

在闽越人航海活动的基础上，福建海外交通也开始发展起来。西汉初年，江都（治于广陵，即今扬州）王刘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珠玑、犀甲、翠

〔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79页。

〔2〕袁康：《越绝书》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3册，第104页。

〔3〕《汉书》卷64上，《严助传》第2778页。

〔4〕《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82页。

羽、蜃熊奇兽，数通使往来，约有急相助”〔1〕。珠玑、犀甲、翠羽都是来自海外的产品，据载：“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2〕旧交阯指的是日后安南、占城之地，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公元前 2 世纪，福建南与越南，北与江淮都有了海上交通，并且与海外有了初步的贸易往来。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汉武帝发兵攻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3〕可见闽越人对与海外的交通已相当娴熟，故以海外为逃遁藪。闽越人的航海活动为日后福建海外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东冶港的开辟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朝攻灭闽越之国，鉴于“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4〕。然而，实际上闽越遗民仍不在少数，“后遁逃（山谷）者颇出，因立为冶县，属会稽郡”〔5〕，以治之。冶县盖以越王冶铸为名，寻为东冶县，县治故地即今福州。

汉朝平定闽越之后，拥有先进文化的中原汉人不断迁徙入闽，

〔1〕 《汉书》卷 53，《江都易王传》第 2417 页。

〔2〕 《后汉书》卷 31，《贾琮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111 页。

〔3〕 《史记》卷 114，《东越列传》，第 2981 页。

〔4〕 同上书，第 2984 页。

〔5〕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28，《福建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3638 页。

与闽越遗民融合，吸收了闽越先进的航海技术，使福建的海外交通出现了显著的发展。东冶县治福州为当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处于江海通津之地，交通便利。闽江流经其南境汇入大海，闽江及其众多支流深入内地，形成扇形的交通运输网络，使福州便于联系广阔的经济腹地。自福州以下的闽江入海水道深阔，利于航运，海船可以从闽江口溯流而上，直抵台江，沿岸的琅岐、琯口、闽安、马尾都是可供海船停泊的天然良港。出闽江口则是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的交汇处，前往我国北方和两广诸港以及海外诸国都很方便。因此，汉朝利用福州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人民擅长航海的传统，将其开辟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据《后汉书》记载：“建初八年（83年）（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1〕足见至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开辟了定期的航线，海上交通相当频繁，是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来自中南半岛的海外商品皆在此集散转运。

建初八年之后，由于新辟了经由广东、湖南的陆路运输，进口商品才改由陆运北上，自此广州港迅速崛起，取代了东冶港的地位，但是东冶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对外交通港口。东汉末年，桓晔因“初平中（190—193年），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2〕袁忠、许靖与袁沛、邓子孝等人亦自会稽“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即航海先至东冶，再继续前往交趾。〔3〕以上都表明，东冶港与中南半岛的航运继续畅通无阻，在

〔1〕《后汉书》卷33，《郑弘传》第1156页。

〔2〕《后汉书》卷37，《桓晔传》，第1260页。

〔3〕《后汉书》卷45，《袁闳传》第1526页。《三国志》卷38，《许靖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4页。

东南海上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第三节 东冶港与日本、夷洲、 澶洲的海上交通

在汉代，东冶港不仅有与中南半岛交通的南海航线，而且还开辟了跨越大洋与日本、夷洲、澶洲交通的东海航线。日本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倭”，地理上位于福州的东北，相去甚远，但是《后汉书》却记载：倭，“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1〕。很可能东冶是当时中国与日本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故古人才认为日本是在福州之东。

《后汉书》又记载：“又有夷洲及澶（又作‘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布）会稽东冶县人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2〕夷洲，史家已考证即今台湾，说明东汉时福建与台湾之间已经有了海上交通。那么澶洲又在哪里？有的学者认为澶洲是指日本。然而在汉时日本与中国有相当频繁的交往，已为中国人所熟知，并非“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之地。《后汉书·东夷列传》对“倭”地的方位有相当详细和准确的记载，且云：“自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3〕即女王国和拘奴国为倭人之极南界，自此以南不属倭的范围。而澶洲在会稽海外，人民不属倭种，其地理位置只能到日本列岛以南寻找。还有的学者认为澶洲是指琉球群岛，然而史籍记载明确指出：澶

〔1〕《后汉书》卷 85，《东夷列传》第 2820 页。

〔2〕〔3〕同上书，第 2822 页。

洲之上居民有数万家，即人口达十几二十万。这在古代是相当可观的数字，表明澶洲应是地域范围很大的岛屿，而琉球不过是弹丸蕞尔小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无可能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口，所以澶洲不是琉球。

其实澶洲指的是今菲律宾。在古代，菲律宾的土著居民是属于尼革利陀（Negrito，又称小黑人）人种的阿塔斯人（Atas）。阿塔斯人又称为 Hitan 人，在中国文献中译作“海胆”人，曾广泛分布在菲律宾群岛。大约公元前 3000—1000 年，原始马来人经由巴拉望从大陆进入菲律宾，但人数并不太多，只是到了公元前 200 年之后，续至马来人开始从印尼群岛迁徙到菲律宾群岛，这一迁徙过程一直持续到近代，才逐渐改变了菲律宾的民族构成，续至马来人成为主体民族。所以在公元前后，海胆人是菲律宾的主要居民，至宋代分布仍相当广泛，赵汝适的《诸蕃志》对其风俗、习惯有生动的描写。^{〔1〕}甚至西班牙人入侵之后，在吕宋、民都洛等岛屿的山区居民仍是海胆人，“印度人（指马来人）与他们处于战争中，捕获并出卖他们，还把们作为奴隶使用”^{〔2〕}。澶洲意为“海胆人居住的岛屿”，指菲律宾群岛。“海胆”——Hitan 的重音在 tan，“澶”即其译音，意指“海胆人”。海胆人属黑色人种，所以至宋代，人们又把吕宋、民都洛岛称作“麻逸国”^{〔3〕}，阿拉伯人则称其为 Ma'it。^{〔4〕}麻逸 殆 Ma'it 之对音，犹言“黑人之地”，其意义实与“澶洲”同。宋代的文献也记载，菲律宾群岛上的毗

〔1〕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屿》，中华书局 1996 年校释本，第 143~144 页。

〔2〕 E. H. Blair & J.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1907. Vol. 3. p. 61.

〔3〕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麻逸国》第 141 页。

〔4〕 G. R. Tibbetts, *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 Leiden & London, 1979, p. 53.

阇耶（又作“毗舍邪”）人、白蒲延人常经由菲律宾北部、台湾、澎湖，横渡台湾海峡，来到福建沿海，〔1〕这是一条很古老的航线。汉代澶洲“人民时至会稽市布”应该就是取这一航线的。《后汉书》的记载还表明，当时东冶县人民亦对海外航行习以为常，有的还移居到菲律宾群岛。

到了三国时期，孙吴政权锐意经营东南，利用东南海洋地理优势和沿海人民的造船航海技术，致力发展海外交通。因此在闽中设建安郡，并在侯官县（今福州）置“典船都尉”，专司造船，“主谪徒作船于此”都尉营“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2〕建造海船。此后又在今霞浦附近设“温麻船屯”〔3〕，用类似“屯田”的方式，征集当地的工匠和劳动力，建立更大规模的造船基地。据说孙吴政权曾建造可容 3000 人的大舡，〔4〕这或是夸大之词，但也反映了吴国造船业的发达情况和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据记载，当时的海船“弘舸连舳 巨槛接舳 ……槁工楫师，选自闽禺”〔5〕，换言之，即吴国优秀的航海家和技术人员都是来自福建。可见福建的航海技术在全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在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基础之上，吴国建立起一支庞大的海军和船队，开展大规模的航海远征活动。

〔1〕楼钥：《攻媿集》卷 88，《汪公行状》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53 册，第 363 页。叶适：《水心集》卷 24，《周镇伯墓志铭》，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64 册，第 430 页。

〔2〕《八闽通志》卷 80，《古迹》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86 页。

〔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 1107，《福宁州城池考》、《建置沿革考》中华书局 1934 年影印本。

〔4〕《太平御览》卷 770 引《武昌记》，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99 册，第 774 页。

〔5〕左思：《三都赋·吴都赋》，载肖统编、李善注《文选》卷 5，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1 页。

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虽因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1〕从征将士达万人，航海的规模是空前的。在宋代之前，从中国大陆前往菲律宾群岛，因季候风的缘故，来回需二年以上，以“卒不可得至”一语度之，吴国舰队并非没有能力远航菲律宾，只是考虑到时间的因素，不能及时返航而放弃了远征而已。其实三国时期，福建与澶洲之间的交往是相当频繁的，据载：“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澶洲者。”〔2〕吴国的舰队不仅远征夷洲、澶洲，而且还从东冶港远征中南半岛。据说早在汉代，中国的海舶就已经“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绁，挂帆席……或挈挈洩洩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3〕。裸人、黑齿指的是当时中南半岛上的土著部落。建衡元年（269年），吴国派遣“监军李勣、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4〕。可见三国时期，福建的海外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交往的地区仍限于中南半岛和夷洲、澶洲，海上航运还处于“循岸梯航”的状态，尚停留在开创阶段。

〔1〕〔2〕 《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第1136页。

〔3〕 木玄虚：《海赋》，载肖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页。

〔4〕 《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第1167页。

第二章 晋至五代福建海外交通的初步发展

从晋至五代，由于中原乱离，人民相继南迁入闽，不仅为福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而且还引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加速福建的开发。在这个历史时期，福建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开始勃兴。在此基础上，福建的海外交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表现不仅在于福州港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还表现在福建对外交通港口的增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急剧扩大。

第一节 东晋以来福建经济的开发

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陷于长期战乱，而江南社会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量南徙，地广人稀，偏踞东南一隅的福建成为吸纳北方人口的重要地区。乾隆《福州府志》云：“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云：“东晋南渡，

〔1〕 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引《九国志》，《中国方志丛书》本，1967年版，第1384页。

衣冠士族多萃其地（泉州），以求安堵”〔1〕；因此晋分立晋安郡。〔2〕尤其在唐、五代，人口增加的趋势更加显著。隋代福建的户数为 12420 户，〔3〕到唐建中年间（780—783 年），达到 93535 户，〔4〕增长了 6.5 倍以上。中原人民大量入闽，不仅为福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福建的社会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沿海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秦汉时代，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是在闽北的闽江流域，此时沿海的晋江、九龙江下游平原也相继得到开发，经济加速发展，直追较为先进的区域。

一、农业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从晋代开始，福建人民在沿海的四大平原掀起兴修水利工程的浪潮。晋时，为使晋安郡（今福州）城免受水患和使农田有充足的水源灌溉，晋安人民修了东、西湖，湖周各达 20 里，“引东北诸山溪水注于东湖，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西湖，二湖与闽海潮汐通，所溉田不可胜计”〔5〕。隋时，各地水利建设成绩

〔1〕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02，《泉州》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70 册，第 104 页。

〔2〕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30，《泉州》第 3724 页。

〔3〕 《隋书》卷 31，《地理志》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879 页。

〔4〕 杜佑：《通典》卷 182，《州郡十二》，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05 册，第 505~506 页。

〔5〕 王应山：《闽郡记》卷 15，《西湖沿革》，《中国方志丛书》本第 99 页。

更加显著。隋时连江县修筑了东湖，灌溉民田达 4 万多亩。^{〔1〕}宁德县修建了仙湖，“食小溪水……溉田千余顷”^{〔2〕}。唐时，闽县令李萑发动人民筑海堤，修塘浦，使沿海的大片耕地摆脱了海潮的威胁，盐卤之地变成良田。^{〔3〕}福清于天宝年间也筑了天宝陂，“溉田数千余石”^{〔4〕}。莆仙平原隋时尚为沼泽，至唐得到开发，成为沃田。^{〔5〕}晋江流域大兴水利，筑有东湖、尚书塘和仆射塘等，溉田达数百顷；为了改造滨海碱地，还兴建了其他的海埭。^{〔6〕}随着水利的兴建，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泉州遂由中州提升为上州。^{〔7〕}隋唐之际，漳州地区居住着被称为“蛮獠”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较低。垂拱二年（686年），唐朝设置漳州，任命陈元光为刺史。陈元光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将大片荒地变成稻田蔗圃。^{〔8〕}

经过从东晋至唐、五代的开发，福建改变了原先的落后面貌，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进步。陈初，浙江会稽发生饥荒，“会稽尤甚”割据晋安（今福州）一带的陈宝应乘机运载米粟到会稽贸易，

〔1〕 邱景雍：《连江县志》卷 3，《大事记》卷 5，《水利》，《中国方志丛书》本，第 19、40 页。

〔2〕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 16，《版籍类·水利》，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84 册，第 259 页。

〔3〕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 121，《李萑传》台湾华文书局 1968 年版，第 2225 页。

〔4〕 陈衍：《福建通志·水利志》卷 1，第 24 页。

〔5〕 廖必琦：《莆田县志》卷 2，《舆地》卷 3，《建置》，《中国方志丛书》本，第 68、115 页。

〔6〕 朱升元：《（乾隆）晋江县志》卷 1，《舆地志·水利》，《中国方志丛书》本，第 33~36 页。

〔7〕 《唐会要》卷 70，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07 册，第 59 页。

〔8〕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版，上册，第 116 页。

换取玉帛子女。^{〔1〕}晚唐咸通时，唐朝用兵岭南，为解决军粮问题，动用大船数十艘，从闽中运粮三五万石赴广州。^{〔2〕}这表明福建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已成为粮食外调地区。农业生产的提高不仅为手工业、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使福建沿海成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为福建人走向海洋，发展海外交通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手工业

福建负山面海，物产丰富，“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3〕}，具有发展手工业的有利条件。在经济开发的浪潮中，手工业日益兴起，其中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纺织、矿冶、陶瓷、制茶等部门。

纺织业 到了唐代，福州的蕉布、建州的蕉花和泉州的棉丝、蕉葛已被列为贡品；^{〔4〕}但绢紵等产品质量仍较差，在全国仅列为第八等。^{〔5〕}然而至晚唐、五代，丝绸业的进步非常显著，闽国统治者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中，有品种繁多的纺织品，还有不少如锦、绮罗、红蕉、蝉纱等高级纺织品，而且进贡的数量很大。^{〔6〕}反映纺织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矿冶业 金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闽越时代，然而关于采冶的记载则出现于唐代，当时福建共有九县有矿山，即将乐、尤溪、宁

〔1〕 《陈书》卷 35，《陈宝应传》中华书局 1972年版，第 486页。

〔2〕 《旧唐书》卷 19，《懿宗本纪》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 625页。

〔3〕 《宋史》卷 89，《地理志·福建路》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2210页。

〔4〕 《新唐书》卷 41，《地理志》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1064~1065页。

〔5〕 《唐六典》卷 20，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95册，第 192页。

〔6〕 《十国春秋》卷 91、92，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1324、1341页。

化、建安、福唐、邵武、长汀、沙县、南安等，产品有金、银、铜、铁。〔1〕唐会昌年间（841—846年）在福建还设置铸钱监，铸造以“福”字为背文的铜钱。〔2〕五代闽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金银及器皿，每次都有数千两之多；〔3〕统治者还耗费大量金、银、铜等制作佛经和铸造佛像，〔4〕反映了晚唐、五代时期金属的冶炼技术、矿冶生产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制茶业 茶叶为福建名产，福州、建州两地所产尤为著名。福州的“方山茶”品味甚佳，被列为贡品。〔5〕福州、建州产茶，“其味极佳”〔6〕，武夷山所产的丹山碧水茶更负盛名。福建产茶不仅品质优良，而且产量丰盛。唐穆宗时，增天下茶税，福建被列为产茶区之一。〔7〕

陶瓷业 福建的陶瓷生产在两晋南朝时有所发展，至“唐、五代时期，福建青瓷种类虽与前朝大致相同，但窑址已层出不穷”〔8〕，陶瓷业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当时的陶瓷生产主要集中于晋江流域，其中以磁灶尤为著名。自1956年以来，在磁灶已发现唐、五代窑址6处，并发掘出大量的实物，〔9〕证明当时的陶瓷生产相当兴盛，并远销海外。此外，福建的制盐、制纸、制糖和印刷等也相继兴起，手工业方面明显缩小了与其他先进地区的差距，

〔1〕《新唐书》卷41，《地理志》第1064~1065页。

〔2〕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53引《钱谱》第1073页。

〔3〕《十国春秋》卷91、92，第1324、1331、1339、1341页。

〔4〕《新五代史》卷61~68，《闽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

〔5〕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土俗类·土贡》第575页。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

〔6〕陆羽：《茶经》卷下，《八茶之出》学津讨原本第12页。

〔7〕《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8〕陈鹏：《福建青瓷考察》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9〕叶文程等：《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载《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这对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海外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商业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逐渐趋于繁荣。《隋书·地理志》云，福建“其俗又颇同豫章”，妇人善于做买卖。到唐代商业开始勃兴，福州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当地人有“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遗俗”〔1〕，商业之繁华闻名遐迩，号称“福建大藩”〔2〕。及至五代，闽国统治者奖励工商，“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廓市，匪绝往来，衡麓舟蛟，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3〕，国内外贸易非常活跃，也进一步推动海外交通的发展。

第二节 梁安郡的设置与海外交通

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开发，迫切要求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但福建三面为崇山峻岭所阻隔，妨碍了与内地的联系，只能面向东部的海洋，发展海外交通。从东晋至五代，除了福州港作为主要的出海口继续发展之外，还新辟了其他的港口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梁安郡的开港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记载，印度西北优禅尼国僧人拘那

〔1〕 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载《全唐文》卷 390，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54 页。

〔2〕 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载《全唐文》卷 337，第 1511 页。

〔3〕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引自《十国春秋》卷 90，第 1304~1306 页。

罗陀，又名真谛，曾泛大海于梁大同元年（546年）抵南海（今广州），两年后抵建康（今南京），因侯景之乱，不能安居，自承圣三年（554年）后辗转播迁于今江西、广东等地。陈永定二年（558年）到达福建的晋安郡（治所即今福州）；又泛小船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继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1〕。

此“梁安郡”位于今福州与广州之间，当时有大舶通印度，可见是南朝重要的对外交通港口，但是有关的正史《地理志》对它的记载却付诸阙如，因此长期以来关于梁安郡港口的地理位置显得扑朔迷离，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其地不可考。〔2〕有的认为，梁安郡乃是“传写之误”〔3〕；还有的则认为，梁安郡在今广东惠阳一带。〔4〕直至1983年章巽先生发表《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一文〔5〕对梁安郡的今地作了精辟的考证，将其确定在今南安县丰州，该问题似乎是有了定论，其功不可没焉。然而，章巽先生对梁安郡的考证，只是证明真谛曾到过梁安郡，并未提出梁安郡港口为今泉州之有力证据。另外，关于梁安郡的设置年代及其历史的考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尚需进一步讨论。

关于梁安郡的始置年代，章先生未加具体说明，只是说，“梁安郡存在的时间，应该是从梁代天监（502—519年）年间到陈代

〔1〕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430页。

〔2〕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3〕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页，注14。

〔4〕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5〕 载《福建论坛》1983年第4期。

天嘉五年(564年)这段时间。天嘉五年年底陈朝十定今福建地方,以后不久当即改称梁安郡为南安郡了”;至隋代又改名南安县。是否如此?

根据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记,“公讳义童,字元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珪符五等,营室迥于羽仪,山河入于盟誓。父方贲,梁正阁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以惠和之德,有文武之才……武德四年(621年)诏公为江南道招讨使……诏除泉州都督,封建昌县男,食邑三百户……境接东瓠,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1〕。按,碑文中王义童之父王方贲无疑即《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亦作王方贲,应以碑文为正。

从上碑文可证:一、王义童之祖王僧兴齐时任“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梁安郡治所无疑是在今南安县;二、梁安郡在齐代已存在,并非始置于梁代,换言之,在梁朝代齐之前已有梁安郡之设;三、南安县齐时已有其名,梁时废焉,非隋代才改称。

梁安郡究竟始置何时?郡在齐代既名梁安,王僧兴又封“开国侯”,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梁安郡的设置和王僧兴封“开国侯”与肖梁代齐有密切之关系。

南齐末年,齐帝肖宝卷实行暴政,又大肆诛戮大臣,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永元二年(500年),齐雍州刺史肖衍起兵于襄阳,翌年另立肖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改元中兴。不久,肖衍率军攻入齐都建康,杀肖宝卷,掌握了南齐政

〔1〕 杨炯:《盈川集》卷7,《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5册,第243~244页。

权。中兴二年（502年），肖衍受齐禅，该年四月即皇帝位于建康，改年号为天监，正式建立梁朝，这就是梁武帝。

但是梁的“建国”，实际上要早于天监改元。肖衍控制南齐政权之后，于中兴二年二月进位相国，总百揆，进封梁公（后又加封为梁王）此被视为梁的“开国”故齐宣德皇后的诏书云：“梁国初建，宜须综理，可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1〕大概是在此时，肖衍以齐朝的名义，析晋安郡晋安县置梁安郡，并改县名为南安县，王僧兴被任为齐朝的梁安郡太守，封“开国侯”。所以梁安郡的始置年代当在齐中兴二年二月，而不是梁天监中（502年4月—519年）否则的话，在《王公义童神道碑》中，王僧兴就不能被称作“齐梁安郡守”，而应该是“梁梁安郡守”了。总之，梁安郡的设置是在南齐末年，而不在梁朝。

梁安郡后来改名南安郡大致是在陈代天嘉五年（564年）。梁朝末年发生侯景之乱，晋安豪族陈宝应乘机割据闽中，〔2〕直到陈朝建立，于天嘉五年用兵平定陈宝应之乱后，才将梁安郡改名为南安郡。

梁安郡之设置与琅琊王氏家族有很大的关系。根据《王公（义童神道碑》王义童“其先琅琊临沂人也”即为山东琅琊士族王氏的后裔。

琅琊王氏自曹魏之后，位望日隆，公卿辈出，为关东显赫的世家大族。西晋司马佃（司马懿之子）徙封琅琊王，即与王氏交相结托，以争取关东士族的支持。永嘉之际，晋室与北方士族南渡，司马佃之孙、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兄弟的辅佐下，建立东晋王朝。从此王氏与皇权相结合，其权势益加煊赫，有如日中天，时

〔1〕《梁书》卷1，《武帝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2〕《陈书》卷35，《陈宝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6页。